

一部晚清旗人手稿中的漢字量化與改革研究^{*}

馬騰著^{**} · 張雪譯^{***}

摘 要

位於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中藏有一部頗為有趣的手稿。它除了正文外，還夾雜著一些折疊過的散頁；作者不詳，不過當中寫到一個時間：光緒十九年（1893）。這部手稿的內容極具特色，顯示出它與晚清以文言文為主的傳統教育、滿文以及通俗官話的書寫方式關係匪淺，顯然是清末旗人群體中多語言書寫文化之產物。這篇文章將循著以下兩條線索展開論述：其一，藏於聖彼得堡的這部手稿，源自於何種資訊管理文化，又是如何推進這種文化？其二，它如何使用滿文文字，且這種使用方式此前是否有先例？通過回答這些問題，筆者試圖說明，旗人群體及其特有的語言資源，是理解近代中國的書籍史、資訊管理以及通俗教育發展所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關鍵詞： 滿文、語言、書寫文化、晚清、旗人

* 致謝：中研院近史所滿文讀書會，特別是張哲嘉，對我理解本文所涉及的材料提供了幫助；阮思德（Bruce Rusk）分享相關材料並點評了本文；巫仁恕仔細閱讀本文，並提供了反饋意見；邊和、郭津高回答了我的一些疑問。邊和、黃蕙如和蔡名哲幫忙校對了最終定稿。本文原訂在2020年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上發表，但年會因新冠疫情而取消；之後改於2020年11月3日中研院近史所舉辦的「知識、性別與城市」聯合工作坊上發表，會中李仁淵提出了若干寶貴意見。最後，本篇的審查人與《集刊》的匿名編輯指正了不少錯誤與脫漏的地方。

收稿日期：2020年9月1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9月30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美國里德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

一、前 言

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中，藏有一部奇特的手稿。作者不知何許人，只見手稿裡夾雜了些許折疊散頁，其中一張用滿漢雙語寫著：光緒十九年（1893）。¹手稿的主體是所謂的「冊子」（滿文 *cese*），主要是二份統計清冊，記錄了當時常用辭書中漢字的數目。清代有兩部最為常見的漢語工具書，一是按漢字書寫結構及部首排序的《康熙字典》，一是按發音分部的《五方元音》；手稿詳細羅列出兩部辭書所收錄的字符，算明辭書各卷裡漢字的數目，同時還採用了一種數字符號——蘇州碼。蘇州碼原本廣泛應用於商業領域，罕見能出現在滿文書籍或漢字音韻學著作中，因此頗耐人玩味。

這部手稿的特點之一，是與算字數以利背誦的漢語學習傳統不同。首先，《康熙字典》與《五方元音》都是卷帙浩繁、囊括中文書面語全貌的辭書，可見它關注的範圍不限於儒家經典或啓蒙教材。其次，手稿順著兩部辭書不同的分類結構，同時按照字形及字音來編排漢字。它不僅提示這兩部辭書收錄了多少字符，也想告訴讀者漢字的某種讀音或寫法為何。如此細緻的考察，展現出它想對漢語文字進行量化處理的企圖。

手稿的另一大特點，在於它能嫻熟地運用滿文來注釋通俗官話。這部手稿大量使用滿文來注解漢字生字，甚至還能適切地用滿文來注寫官話文章。當其時，倡議利用新式拼音符號來書寫漢語的呼聲才剛浮現，一般常以為這是受到西方的啓發，而這份聖彼得堡手稿正可用以說明，晚清語言文字的改革，事實上與清代的辭書編纂、啓蒙讀物及旗人文化也大有關聯。

¹ *nikan hergen-i ton be baicame araha cese* 查寫漢字數目的冊子，清鈔本，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索書號 C 58 mss。此鈔本共一卷二十頁（正反頁作一頁），每頁九行；每頁長 22.5 公分，寬 21 公分。描述見 Tatjana A. Pang,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Manchu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ssue 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1), p. 126, item 286.

藏於聖彼得堡的這部手稿，顯示出它與晚清以文言文為主的傳統教育、滿文以及通俗官話的書寫方式關係匪淺，顯然是清末旗人群體中多語言書寫文化之產物。本文將遵循以下兩條線索展開論述：其一，這部手稿究竟具備何種資訊管理文化（information management culture），又是如何推進這種文化？²其二，它如何使用滿文，且這種運用方式是否有先例可循？通過這些問題，筆者嘗試說明，旗人群體及其特有的語言資源，是理解近代中國的書籍史、資訊管理以及通俗教育發展所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關於這部手稿的來源，我們所知甚少，因此本文主要依賴內部證據來還原手稿的時空背景與語言情境，並且根據東方文獻研究所的收藏情況，來推斷手稿源自何方。另外，筆者還將藉由手稿裡提到的書籍，來考訂手稿的創作時期，回歸到當時的文化語境來討論。清末時期，作為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而引領時代精神的梁啟超（1873-1929），也曾量化計算過漢字，並且強烈支持語言文字改革。因此，下文將先以梁啟超為例，與這部聖彼得堡手稿進行對照比較。

二、時代背景：十九世紀末的漢語文字改革

光緒二十二年（1896），梁啟超撰寫多篇文章，概括性地描述了漢語書寫系統的現狀，並試圖推動一系列方案以期提高識字率。此時，清帝國剛剛經歷了甲午戰爭的慘敗，梁啟超本人也剛接觸到嚴復（1854-1921）翻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赫胥黎的作品。與此同時，在一些地區的教會學校，越來越多學生開始質疑、甚至挑戰主流教學方法與標準語文課程。因此，梁啟超感到教育改革勢在必行。³為了給課程改良奠定基礎，梁啟超首先評估了啟蒙教育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漢字書寫系統。在〈論幼學〉中，梁氏估算了核心漢字數量後，

² 受益於 Ann M. Blair,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一書，「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這一指涉現代早期書籍文化的詞彙得以流行。

³ 梁文的背景，參見 Limin Bai, “Children and the Survival of China: Liang Qichao on Education Before the 1898 Reform,” *Late Imperial China*, 22:2 (Dec. 2001), pp. 124-155.

得出結論：古代使用的漢字有一萬餘個，但「比之於西文，未爲繁也」（梁氏應是將一個西文單詞對應於一個漢字）。梁氏又寫道：「其字之見於群經者，才二千有奇耳」，而「今日通行文字」也恰是此數。⁴梁氏提到西文的書寫系統，可見這正是啓發他計算漢字的靈感所在。

同年，梁啓超支持了所謂的「切音字運動」。最早討論這一運動來龍去脈的學者黎錦熙（1890-1978）認爲，從 1890 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和教育家們提出漢語拼音化的不同方案，並多方地向政府尋求支持。雖然切音字運動發起者背後的動機不盡相同，但在當時，發明注音符號最主要的用途是作爲現有書寫系統的輔助工具，用來簡化書寫或者輔助漢字的識讀，以提高社會底層民眾的識字率。這一階段實施上持續到二十世紀的頭十年。在此期間，改革方案層出不窮，有些受到羅馬字母的啓發，並且受益於西方傳教士在部分地區使用羅馬字書寫方言的既有做法；⁵另一些則借鑑日文假名體系。而後，甲午戰爭和戊戌百日維新更進一步影響了切音字運動，使劇烈的文字變革在公眾眼中成爲必要且可能的舉措。

具體說來，切音字運動始於光緒十八年（1892）。該年，一名懂得英文的福建讀書人受到漢字羅馬拼音轉寫法的啓發，提議用注音符號來記錄福建方言。⁶不久，其他漢字拉丁化方案也紛至沓來。光緒十九年，也就是聖彼得堡手稿完成的同一年，爲西方傳教士擔任過通譯的莫禮智（Mok Lai Chi, 1868-1926）出版了一套簡潔的粵語拼音化方案。⁷三年後，梁啓超爲一份於上

⁴ 梁的〈論幼學〉寫於 1896 年，收入氏著，《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26），冊 2，卷 2，頁 24 下。

⁵ Don Snow, "Romanizing Southern Min: Missionar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s," in Henning Klöter and Märten Söderblom Saarela, eds., *Language Diversity in the Sinophone World: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Language Planning, and Multilingual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 60-79.

⁶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91-92。此書首刊於 1934 年。

⁷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3-25.

海發表、討論漢字拼音的作品作序時，表示了他對這類改革的支持，認為如此有助於提高識字率。⁸

這些通常被看出於切音字運動的拼音方案，以及為其賦予歷史緊迫性的外部事件，很大程度上都源自外國的影響。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切音字運動的歷史中也包含有滿文元素，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後尤其明顯。在切音字運動的領軍人物中不乏有旗人參與，而他們所提出的拼音方案借鑑了此前滿文的教授與學習傳統，而且毫不意外地獲得了旗人民眾的支持。⁹因此，聖彼得堡手稿也應被看作是旗人文化圈的產物。需要注意的是，在部分切音字運動的推動者眼中，旗人文化圈提供了一種有用的文化資源。在本文最後，將討論到更多旗人對此運動的支持，並指出這種態度可能是源於旗人本身已經身處一種樂於接納變動的語言文化中。這部手稿與切音字運動是否有直接聯繫，雖然未可斷定——事實上我們對手稿所知甚少——但將兩者放在同一歷史脈絡下看待，仍然是有意義的，因其體現了同一時期用新式標注對中文書寫系統加以補充和改良的不同嘗試。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對漢字的量化計數還是用表音字符來記錄白話漢語，都並非晚清才出現的新事物。計算漢字字數，然後適度分配在啓蒙教育的各學習階段，一直是中國傳統字學的通用做法。為了應對科舉考試，明清時期的塾師往往會統計儒家各經典的字數，用來估算生徒記誦這些經文所需的時間，而這已經遠遠超出了梁啓超所討論的兒童啓蒙教育。例如，清代學者王昶（1725-1806）在一所根據科舉條目規劃課程內容的書院任教時，曾經寫道：

⁸ 梁啓超，〈沈氏音書序〉，見〔清〕沈學，〈盛世元音〉，收入文字改革出版社輯，《拼音文字史料叢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影印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6 年第 1 版，該版底本為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申報》與《時務報》刻本），冊 2，頁 417-420。Elisabeth Kask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Leiden: Brill, 2008), pp. 99-101.

⁹ C. W. Kastler, "Die neuesten Versuche zur Vereinfachung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Erste Abteilung*, vol. 12 (1909), p. 207. 本史料已獲學者利用，參見 Elisabeth Kask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pp. 136-137. 我將在下文提到另外一個參與切音運動旗人的例子。

「查《詩經》四萬八百四十八字，應以一百三十六日讀完」，¹⁰亦即假設學生每天的進度相當於三百字。此外，世居盛京的內務府漢軍旗人學者唐英（1682-1756），在乾隆十五年（1750）的日記中，也以類似方式統計了若干儒學經文的字數，證明這一做法在清代十分常見。¹¹唐氏採用的是一套滿文與蘇州碼複合型態的計數符號，¹²這與聖彼得堡手稿作者一樣，後文會再討論。

稍晚於民國初期的新式教育，我們仍可看到根據漢字使用頻率來制定課程的做法。民國十三年（1924），朱經農（1887-1951）和陶行知（1891-1946）編纂出版了《平民千字課》，其中所選的常用字，不僅是根據它們是否出現在某典籍中，還考慮它們在該典籍中出現的頻率。而在《平民千字課》出版之際，陳鶴琴（1892-1982）已經開始著手準備他的《語體文應用字彙》，後並於民國十七年（1928）出版。這部書以類似的字頻統計方式選取了四千多個漢字。在〈緒論〉中，陳氏提到幾位統計漢字字數的先驅，但是他們都是外國人。¹³雖然朱、陶二人和陳氏所推行的教育模式都與中國的古典教育形成強烈反差，但我們仍然可以將他們的字數統計手段看作是一個並非靜止或停滯傳統中的新篇章。

總體而言，計算漢字並非梁啟超或是聖彼得堡手稿作者的獨特發明。梁氏同許多前輩學者一樣，都只是單純統計某些書籍的漢字總數，然而聖彼得堡手稿則是根據字形與字音來對漢字進行統計。

¹⁰ [清]王昶著，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點校，《春融堂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以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初刻本為底本，同時參校光緒十八年[1892]補刻本），冊 3，卷 68，〈友教書院規條〉，頁 1122。王昶的例子見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266-267. 另外，Li Yu, “Character Recognition: A New Method of Learning to Rea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33: 2 (Dec. 2012), pp.10-11.

¹¹ 張發穎主編，《唐英全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冊 2，頁 393。

¹² 張發穎主編，《唐英全集》，冊 2，頁 398。

¹³ Yurou Zhong, *Chinese Grammatology: Script Revolution and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1916-195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28-131 and p. 229, n17.

用表音字符記錄白話漢語也是由來已久，往往出現在中國歷史上多語言交匯的情境中。例如，元代的蒙古統治者使用八思巴字母記錄漢語；¹⁴明代以降，中國西北的穆斯林用阿拉伯字母來記錄漢語方言。¹⁵在清代，使用滿文字（清字）來標注漢字單字的方式屢見不鮮。嘉慶十三年（1808），一位任教於旗人官學的漢教習，在一部《四書總字音》中用滿文對漢字詞條進行了注音。¹⁶用滿文來記錄長段白話漢語的做法也有不少例證，十八世紀小說《好逑傳》現存的殘缺鈔本就是如此，而且並非孤例。¹⁷十八世紀耶穌會士的報告也提到：「韃靼人用他們的韃靼字母記錄口頭漢語。」¹⁸這種做法廣泛流傳後，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關注，將此視為漢文白話小說侵蝕並危及旗人士氣的證據。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二十九日的上諭中，表示：「甚有不通漢文者，並將小說亦照漢字之音，以單清字音出，互相傳看。」¹⁹這份上諭所描述的恰恰就是用滿文字、而非漢字來書寫官話的情形。聖彼得堡手稿的存在，證明此現象至少持續至1890年代。下文會談到，這種用滿文字來書寫官話的做法，使得滿文實際上成為直接或間接教授官話的工具，並且影響了之後的切音字運動。

然而梁啟超及其所支持的語言改革家們，似乎都沒有注意到這些固有做法。他們受西方啟發，致力於創造新的轉寫方法以提高識字率。與此同時，聖彼得堡手稿的旗人作者卻在不經意間使用滿文文字來書寫白話漢語，同時也為

¹⁴ W. South Coblin, *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 91.

¹⁵ A. Forke, "Ein islamisches Tractat aus Turkistan. Chinesisch in arabischer schrift,"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8:1 (1907), pp. 1-76.

¹⁶ 參見〔清〕秦文淵輯，〔清〕陳正宣校，《四書總字音》（嘉慶十二年[1807]版），最末頁不知名人士的補述說明。該書見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古籍特藏系統，索書號為T/885/5903。

¹⁷ Hartmut Walravens, ed., *Mandjurische Bücher in Rußland: Drei Bestandskataloge* (Hamburg: C. Bell Verlag, 1986), p. 91.

¹⁸ Pierre-Martial Cibot (韓國英), "Essai sur le passage de l'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 à l'Écriture alphabétique, ou sur la maniere dont la premiere a pu conduire à la seconde," dans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c. des Chinois*, vol. 8 (Paris: Nyon l'aîné, 1782), pp. 112-132.

¹⁹ 〔清〕乾隆五十一年敕撰，《欽定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卷首11，頁42a，總頁240。

生字注音。對照聖彼得堡手稿與梁啟超自光緒二十二年以降的文章，即能見到漢語及其書寫方式在十九世紀末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而且變化已經超出聚集在通商口岸並深受西方影響的知識階層，深入到了不知名的旗人社群中。那些最為著名的晚清語言改革家，以其政治取向和教育背景而受到後人關注，但卻鮮少有學者注意到，此時滿人（或者說旗人）群體的書籍文化也相應呈現出動態。聖彼得堡手稿以及它使用到的材料表明，閱讀、書寫漢語的新方式此時也正在旗人書籍文化中孕育。以下筆者將試圖證明，在晚清中國的教育和語言劇變中，旗人及其滿文文化仍扮演著十足重要的角色。

三、聖彼得堡手稿的來源

藏於聖彼得堡的這部手稿，裡頭夾雜的一紙散頁中載明了一個日期：光緒十九年四月初五日（1893年5月20日）。這個日期用滿漢雙語寫成，出現在一則滿漢雙語筆記中，字跡清晰、筆順流暢。學者們並不清楚此一手稿是如何流入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但流入時間自然晚於1893年。

目前已知東方文獻研究所從十九世紀末起多次入藏大宗滿文書籍，其時間順序如下。1898年，研究所從Nicholay Nikolaevich Krotkov（1869-1919）處收到第一批滿文藏書。Krotkov在1894至1912年間旅居伊犁和烏魯木齊，對研究所的館藏貢獻頗多，並一直持續到1898年以後。Krotkov對滿人的薩滿信仰有著強烈的興趣，且收集到的材料都來自新疆。東方文獻研究所收入的第二批滿文文獻來自Aleksy Osipovich Ivanovsky（1863-1903）。Ivanovsky自1889年夏至1891年夏曾在中國內地和東北地區待過兩年，收集了一批「索倫語、達斡爾語，以及滿語的材料」。²⁰Ivanovsky去世後數年，他的藏書流入了研究所。之後，1923年，研究所又從A. A. Dyakov、Fedor V. Muromsky（1879-1910）、A. V. Rozov處獲得另外一批藏書，其中Muromsky曾陸續於

²⁰ Hartmut Walravens, *Aleksej Osipovič Ivanovskij, A Little Known Russian Orientalist: A Bibliographical Sketch* (Hamburg: C. Bell, 1982), p. 2.

1906年、1907年至1908年間旅居伊犁，與當地的錫伯人有過交往。²¹1927年，研究所又從 V. A. Kazakevich 處收入若干滿文藏書。最後，東方文獻研究所在1936年收到了來自 A. V. Grebenschchikov (1880-1941) 的藏書。Grebenschchikov 於1908年至1927年間，曾在東北地區搜集資料，他顯然對語文材料有興趣，同時也從事滿人薩滿信仰的研究。²²這本聖彼得堡手稿很可能就在這幾批藏書中，只是它的索書號並不屬於這幾批藏書，研究所的公開目錄也並未列出這部手稿原本的收藏者。²³因此，筆者僅能判斷，這部手稿可能來自新疆、東北地區或北京，它被俄國藏家收藏的時間大致在1893年到1927年之間，也就是從成書到 Grebenschchikov 從中國帶回最後一批藏書這段期間。

既然聖彼得堡手稿出現在西方藏書中，這讓人不得不懷疑它是否為 Krotkov 或 Muromsky 等學者在調查新疆錫伯人社群時所作。但筆者不認為這部手稿是上述任何一位俄國學者所能完成的，因為手稿明顯是用中國製作的毛筆寫就，所使用的紙張也來自中國，裡頭的漢文、滿文書寫也都非常流利。而且，除了在編目過程中用鉛筆添加的索書號之外，手稿中見不到任何西里爾或拉丁字母。比較這部手稿與 Muromsky 的田野調查筆記，可見 Muromsky 是用西里爾字母來轉寫錫伯人誦讀的滿文材料。成年之後才學習滿語和漢語的外國人，採取這樣的記錄方式是合乎情理的，所以很難想像 Muromsky 這樣的學者會是作者。是故，這部手稿的作者必然是位童年起就接受滿語和漢語教育的人士。最後，認為手稿是應某位外國學者要求而創作的假說，也可以排除。此手

²¹ Hartmut Walravens et al., *Bibliographies of Mongolian, Manchu-Tungus, and Tibetan Dictionari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6), p. 123. 另外，線人們還為 Muromsky 講述、朗讀故事，他對這些故事都進行了轉錄。Muromsky 的筆記後來流入波蘭。參見 Stanisław Kałużyński, *Die Sprache des mandschurischen Stammes Sibe aus der Gegend von Kuldsha*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77), vol. 1, pp. 7-12. Stanisław Kałużyński, “Федор Муромский и собранные им в Кульджинском район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32:2 (1969), p. 75, 沒有提到 Muromsky 收集了任何滿漢雙語書籍。

²² Hartmut Walravens, ed., *Mandjurische Bücher in Rußland: Drei Bestandskataloge*, p. 42; П. Е. 斯卡奇科夫著，В. С. 米亞斯尼科夫編，柳若梅譯，《俄羅斯漢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33-34。

²³ Tatjana A. Pang,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Manchu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ssue 2*, p. 197.

稿涉及到繁重而耗費心力的字數統計工作，因此由上述捐書學者委託他人從事這項艱巨工程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根據手稿的外觀和來源，筆者只能暫時推斷它是由一名旗人在光緒十九年前後所寫成的，創作的地點可能是在北京、東三省或者新疆。

四、聖彼得堡手稿的內容及其特點

（一）一部獨特的滿漢雙語手稿

聖彼得堡手稿內容方面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它的滿漢雙語特性。滿漢雙語書籍大致成形於十八世紀早期，其後流行於整個清代，體裁多樣，產量豐富。特別是在語言教學領域，幫助讀者學習滿文的滿漢雙語教材，直到晚清都很普遍常見，²⁴聖彼得堡手稿可能也正屬於這一類教材。到十九世紀，新式語言參考書的編纂，重點從滿文轉到了漢語詞彙，²⁵聖彼得堡手稿也是如此。滿漢雙語寫作與出版極具多樣性，因此在豐富的旗人作品中發現形式新穎、有趣的手稿也許並不足為奇。然而，筆者從未見過類似聖彼得堡手稿的文本。由於它的內容和形式都非常獨特，在卷帙浩繁的館藏中很快便吸引了我的注意。手稿的源流模糊，又缺少序言或類似副文本（paratextual）的資訊，因而很難確定作者的編纂動機。只知手稿編撰詳細，顯然耗費了一大番心力。

儘管聖彼得堡手稿絕大部分都是關於漢字辭書的字數，但這並非全部。即便不考慮夾雜其中的散頁，只討論正文，它也確實是一本內容蕪雜的筆記冊。滿文書寫通常是從左往右，但由於字數統計佔據手稿核心內容，因此需要以從右往左的順序來進行解讀。更重要的是，在字數統計部分的前頭附有一個標題

²⁴ Evelyn S. Rawski, "Qing Publishing in Non-Han Languages,"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314-317.

²⁵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The Manchu Scrip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ome Aspects of Qing China's Great Encounter with Alphabetic Literacy," in Benjamin A. Elman, ed.,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s, 1000-1919* (Leiden: Brill, 2014), pp. 187-189.

（詳下文），這說明手稿作者將「冊子」視為獨立的作品，而不是任意寫成的零亂隨筆。作者最終可能是要完成一部關於統計漢字總字數的作品，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除了字數統計部分之外，手稿另有五類其他內容。一是一份職官表：官名用滿文，官階品級用漢文；二是類似於止咳糖漿的配方，包括「白葡萄」、「紅糖」等（或因可添加甘草、紅棗而具有一些食療效果）；三是寫在散頁上的幾份食材列表，羅列了各色種子，用碗來計量，例如「黃瓜子一碗」。四是用紅色墨水寫成的一段簡短文字，明顯與道教有關，開篇是「陰魂滾滾」，之後又提到「太上老君」，上面用黑色墨水標寫了「光緒十九年」的日期。²⁶其五，羅列了若干歷史人物的姓名以及相關注釋。

這些內容絕大多數都是漢語，但只有一小部分是用漢字來記的，其餘都是採用滿文字來音譯。換言之，官話漢語的字音是用滿文字轉寫而成（例如，黃瓜記作 *hûwang guwa*，陰魂記作 *in hûn*）。²⁷如前所述，用滿文來書寫官話或簡單文言文的做法在十八世紀早已出現。但這是筆者第一次看到滿文被應用於私人札記，被用來記載食材配方。我們所面對的，顯然是一種白話的讀寫或速記方式，充分利用滿文的語音特質，迴避了漢字書寫的複雜性。整部手稿的字跡是一致的，包括前述散頁中的日期記載，故應是出於同一人之手。在散頁的食材列表中，碗的數量是用蘇州碼來表示的，而統計漢字字數的「冊子」也採用了同樣的蘇州碼，這也是手稿內容均出於同一作者的旁證。

²⁶ 這一段文本還有若干地方有待釐清，在這裡就不全部轉寫。這段文本一共包含有 47 個音節，即 47 個漢字。

²⁷ 一位匿名評審提到漢字「瓜」的滿文轉寫應為 *gûwa* 而非 *guwa*。然而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瓜」轉寫作 *guwa*，而且聖彼得堡手稿中亦復如此。〔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3，卷 29，頁 15b，總頁 185。

(二) 「冊子」

我們現在來討論手稿的主要部分，也就是統計漢字字數的「冊子」。它的標題有長短兩種形式，長標題相當於全書摘要。和其他滿文書籍一樣，這部手稿從左側開頭，外封面寫有滿文標題：

elhe taifin-i hergen kooli bithe, hergen isabuha bithe, | sunja dere da mudan-i bithe, hūlara bithe-i [.....] | hergen-i ton be baicame araha cese
查寫《康熙字典》、《字彙》、《五方元音》、《讀書……〔按：頁面殘缺，文字漫漶不可辨〕》等書之漢字數目的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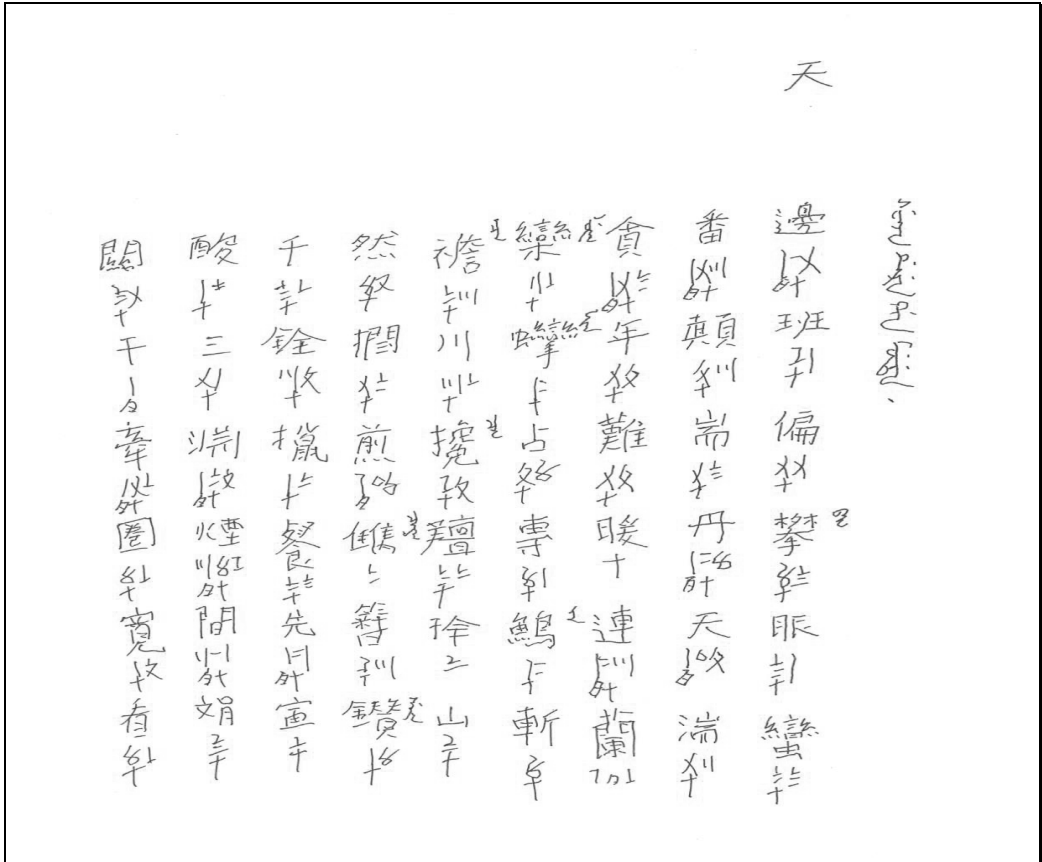
這段文字雖已部分損毀，但筆者認為它相當於正文提要。封面之後是襯頁（flyleaf），上頭寫有滿文短標題：

nikan hergen-i ton be baicame araha cese
查寫漢字數目的冊子

此標題將後面的文本定義為「冊子」（cese），這是一個來源於漢語北方方言的滿文詞。²⁸往後再翻幾頁，就可以看到「冊子」的內容，然而它與絕大多數的滿文書籍不同，而是像漢文書籍一樣，從右往左書寫。「冊子」當中包括滿文和漢文兩種文字，以及一套或許可以算作第三種變體文字的符號，也就是蘇州碼。

²⁸ P[eter] Schmidt, “Chinesische Elemente im Mandschu. Mit Wörterverzeichnis,” *Asia Major*, vol. 7 (1932), p. 614.

圖 1 筆者摹寫的聖彼得堡手稿中的一頁



說明：右方第一行有“sunja dere da mudan”的滿文字，說明這是統計《五方元音》中漢字字數的第一頁。

（三）第一份冊子：《康熙字典》

第一份冊子一共有十頁半（將紙張正反面算作一頁），只帶有一個滿文標題“elhe taifin-i hergen kooli”，即《康熙字典》之名。這部著名的御製字典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出版後，隨即成為根據字形檢索漢字的權威辭書。²⁹儘管清廷曾在道光七年（1827）針對部分訛誤進行勘訂並重刊，這部辭書在有清一代一直保持著經典地位。³⁰

聖彼得堡手稿的作者對《康熙字典》的研究成果，呈現為若干份十一列六行的表格。每列對應一個《康熙字典》中的部首，六行則分別表示「原」、「增」、「古」、「備」、「補」、「共」六類，其中前五行分別與《康熙字典》的內容相對應。大部分漢字都歸於「原」類，原字典裡中標為「增」或「古」的字，則歸入表格裡的「增」或「古」類。第四、第五行「備」、「補」，對應的是原字典中的附錄「備考」（包括有音無義或音義不詳的字）和「補遺」（稀見字）。³¹最後，第六行「共」類則是將每一列中各行的數目相加，得到總字數。

每一格都是某一列跟某一行的交匯，代表相應部首的漢字在《康熙字典》中對應類別的數量。舉個相對不常見部首的例子：根據這一表格，部首「廴」下有 10 個字屬於「原」類，0 個字屬於「增」和「古」類，3 個字屬於「備考」，1 個字屬於「補遺」，總共 14 個字，與《康熙字典》完全對應。³²最後，作者得出一個總數：《康熙字典》總共分爲 214 部，其中一共記錄了 49,036 個字（僅比當代最近的一次統計多出 6 個字）。³³

²⁹ 林玉山，《中國辭書編纂史略》（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頁 98。

³⁰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40。

³¹ 對於《康熙字典》的附錄，參見林玉山，《中國辭書編纂史略》，頁 96。

³² 參見〔清〕凌紹雯、〔清〕張玉書奉敕纂，《康熙字典》（康熙五十五年[1716]版），寅集下：頁 33 上-頁 34 下；寅集備考：頁 21 下；寅集補遺：頁 17 下。這套字典見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古籍特藏系統，索書號 T/5173/0735，原件掃描版目前開放線上閱覽：[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7752267\\$1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7752267$1i)。

³³ 林玉山，《中國辭書編纂史略》，頁 97。

(四) 第二份冊子：《五方元音》

在《康熙字典》之後，聖彼得堡手稿中的另一份冊子題為“sunja dere da mudan”，即《五方元音》名稱的滿文翻譯。這部辭書本質上是一部韻書，換言之，就是一部以字音來排列漢字的字典。從這個意義上說，韻書與《康熙字典》類的辭書可以相互補充。《五方元音》由樊騰鳳（1601-1664）於順治十一年（1654）至康熙三年（1664）間首次出版。³⁴之後，漢軍官員年希堯（1671-1738）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和雍正五年（1727）對此書進行了修訂，並在雍正五年的版本中大幅增加了收錄的字數。³⁵此後，《五方元音》更加暢銷，又經歷了若干次重修和再版。³⁶年希堯的修訂著重於實用性，他也稍微改變了原書原本的音系，以便能更準確地反映漢人的通行語言，也就是官話的發音。³⁷可以斷定，聖彼得堡手稿作者所依據的版本，是年氏雍正五年第二次修訂的版本，也是這部書最流行的版本。³⁸在光緒十九年之前，《五方元音》這一個版本已經至少再版了十次，因此當時應該不難購得。³⁹這是一部收羅豐富的辭書，聖彼堡手稿的作者一共統計出 34,081 個字條。

³⁴ 李清桓，〈《五方元音》音系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引言頁 1、正文頁 1-2。另參見，張曉，〈《五方元音》研究述評〉，《濟南職業學院學報》，2006 年第 6 期，頁 70。

³⁵ 關於年希堯修訂本的出版情況，參見林慶勳，〈論《五方元音》年氏本與樊氏原本的音韻差異〉，《高雄師大學報》，期 2（1991 年 3 月），頁 173。

³⁶ 周賽華，〈《五方元音》版本考〉，《古籍研究》，2016 年第 2 期，頁 73-80。

³⁷ 汪銀峰，〈年希堯增補《五方元音》與清代官話音系〉，《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 年第 2 期，頁 184-191。

³⁸ 聖彼得堡手稿並沒有使用樊氏的原本，聖彼得堡手稿列舉的字數比樊本要多。我對一些韻部的字數進行了比較，也參考了胡琳、馮蒸的〈樊騰鳳原本《五方元音》音節統計與分析〉，《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8 期，頁 29；我還對比了年希堯 1710 年修訂本，確定這也不是聖彼得堡手稿所採用的版本，只有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的 1727 年刻本字數是符合的。參見〔清〕樊騰鳳撰，〔清〕年希堯增補，《五方元音》（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影印道光十三年[1833]《棣香齋叢書》重刻康熙四十九年[1710]版本），收入《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韻書部》，冊 62-63；〔清〕樊騰鳳撰，〔清〕年希堯增補，《五方元音》（雍正五年[1727]版），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³⁹ 如果將 1893 年本算進去，那麼一共有八個版本。周賽華，〈《五方元音》版本考〉，《古籍研究》，2016 年第 2 期，頁 78。

在「冊子」中，《五方元音》的內容被分解為更短的章節。手稿作者對《康熙字典》的字數統計，是遵循字典本身的部首排列順序，而對《五方元音》所作的統計，同樣是根據原作的結構，首先分為十二「攝」，亦即十二個韻部。每一「攝」中的漢字都與韻部起首的字押韻，韻部之內則根據聲母的順序來排列，每一「攝」中都以“b”音開始。手稿作者在每一個韻部下面都標注了一個數字，代表著這個韻部在《五方元音》中所包含的總字數。整體而言，手稿作者試圖通過計數，清楚展現出所有漢字在官話字音庫中的分布情況。

（五）書目

上述兩份清冊的結尾，各附有一個參考書目清單，兩份參考書單相同，都列出包含《康熙字典》、《五方元音》在內的六部書，不過順序並不相同。書目中，在各書的標題之下都註明了該書包含的總字數，而且兩份清單的這類數目都相同。有趣的是，原本附註在《康熙字典》下的字數都曾遭塗掉，添加上新的數目字，而且數字在兩份書目中也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推斷，這些看似草草寫來的清單，事實上經過手稿作者的用心修訂。

在這兩份參考書目中，還包括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的《字彙》初版。《字彙》與《康熙字典》類型相同，它也是清廷編訂字典所參考的重要資料。爲了應對蓬勃發展的商業出版市場需求，晚明時期出現了大量使用依筆畫與部首排列的辭書，《字彙》是其中最爲成功之作。它之所以能廣爲流行，正是因爲它對漢字的筆畫和筆順都進行了規範排序，使其便於檢索。⁴⁰直到清代，《字彙》一書仍非常受歡迎。

聖彼得堡手稿所列出的另一部參考書是《剔弊元音》，即趙培梓（生卒年不詳）於嘉慶十五年（1810）出版的《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的簡稱。正如《字彙》與《康熙字典》，《剔弊元音》與《五方元音》也有密切的關聯，不

⁴⁰ 福田襄之介，《中國字書史の研究》（東京：明治書院，1979），第三部分第三章；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Shape and Sound: Organizing Dictionar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ictionaries: Journal of the Dictionary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no. 35 (2014), pp. 188-190.

過與注重官話音韻的《五方元音》相比，《剔弊元音》則是採取了更為保守的音韻體系。⁴¹乾隆朝後期的科舉考試中頗看重詩學，詩韻知識因而成爲士人應試與菁英社交必不可少的一環；《剔弊元音》清楚地指出官話的韻部與官方認定的詩韻兩者間的對應關係，並藉此整理出一種易於檢索的方式。⁴²在序言中，趙培梓特別強調了按音檢字的好處。他指出，《五方元音》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爲按字形排列的《字彙》提供了一種照字音檢索的補充：

《字彙》檢字，必知其筆畫，乃可檢得。《元音》無論知與不知，但有其字音而讀之不訛者，皆可檢得出。⁴³

《剔弊元音》直至民國時期仍未絕版，它對《五方元音》與便易檢索的重視，說明這部辭書堪稱清代興盛的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潮流中的一分子。因此，聖彼得堡手稿作者也順理成章地將其列入參考文獻，與《字彙》並列，作爲瞭解漢語書面語全貌的重要參考書目。

接下來，在兩份書目中都位居第四的是《養蒙鍼度》。⁴⁴這本啓蒙教材是江蘇常熟的潘子聲（生卒年不詳）於康熙年間所作，並於雍正十三年（1735）由潘氏的學生出版。⁴⁵這本書在清朝共有九個版本，包括相對接近聖彼得堡手稿創作時期的同治六年（1867）、光緒元年（1875）、光緒六年（1880）、及光緒十一年（1885）等的版本。⁴⁶《養蒙鍼度》的內容由附有簡單注釋的生字列表組成，這些生字源自幾部常見初學讀物、儒家經典、其他古代文本，以及一部廣爲流傳的古文選集。⁴⁷列表中收錄的生字數量隨著閱讀進度而逐步減

⁴¹ 李新魁、麥耘，《韻學古籍述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 142。

⁴² 宋韻珊，〈試論《五方元音》與《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的編排體例〉，《聲韻論叢》，輯 7，1998 年 3 月，頁 141。

⁴³ 趙培梓，〈元音創始序〉，收入〔清〕樊騰鳳著，趙培梓改編，《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上海：上海廣益書局，民國年間石印本），冊 1，頁 1 下。

⁴⁴ 扉頁作「鍼」，而序的標題作「針」。

⁴⁵ 潘子聲，《養蒙針度》（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序頁 7、正文頁 3。

⁴⁶ 陽海清、褚佩瑜、蘭秀英編，《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頁 204。

⁴⁷ 即《古文觀止》（康熙三十四年[1695]版）。

少，初學讀物的生字量最多，而儒家經典和文選的生字量相對較少。⁴⁸聖彼得堡手稿作者在《養蒙鍼度》中總共統計到 8,493 個漢字，比現代最新的統計多出 246 個。⁴⁹

潘子聲或他的弟子孫蒼璧在書中提出一個有趣的建議：初學者可以用毛邊紙作成卡片，黏在厚實的皮紙上，然後在卡片上頭寫上需要記憶的漢字。⁵⁰這種技巧讓經典變得更加易於學習。即使是本書作者眼中的「世家子弟」，也只有少數人能有閒空讀遍所有經典。作者承認，類似《康熙字典》或者《字彙》的大型辭書確實收羅更廣、更全，但是《養蒙鍼度》一類的書也有存在的必要：

童蒙散處村鄉城市，雖云一樣讀書，而有貧富之不同，力量之厚薄，購書之難易。總不若《養蒙》之價廉工省。

《養蒙鍼度》的作者認為，這本書提供了一種最快捷的識字辦法。⁵¹和聖彼得堡手稿作者相同，《養蒙鍼度》的作者力求使數量龐大、學習成本高昂的漢語書寫系統，能夠變得更加容易掌握。

最後，兩份書目都提到了一本題為《十三經集字》的書籍，並指出包含漢字在內的總字數為 6,727 個。⁵²即便不將十三經之一的辭書《爾雅》列入計算，這個數目還是遠低於另外十二經的總字數。⁵³《十三經集字》應為一本啓蒙類或參考書目類的讀物，推測最符合這一特徵的，應該是黃蕙田（生卒年不詳）所作、最早出版於同治九年（1870）的《十三經集字音釋》，這也是筆者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版本。⁵⁴

48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附蒙學書目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頁 115。

49 潘子聲，《養蒙針度》，頁 7。

50 潘子聲，《養蒙針度》，頁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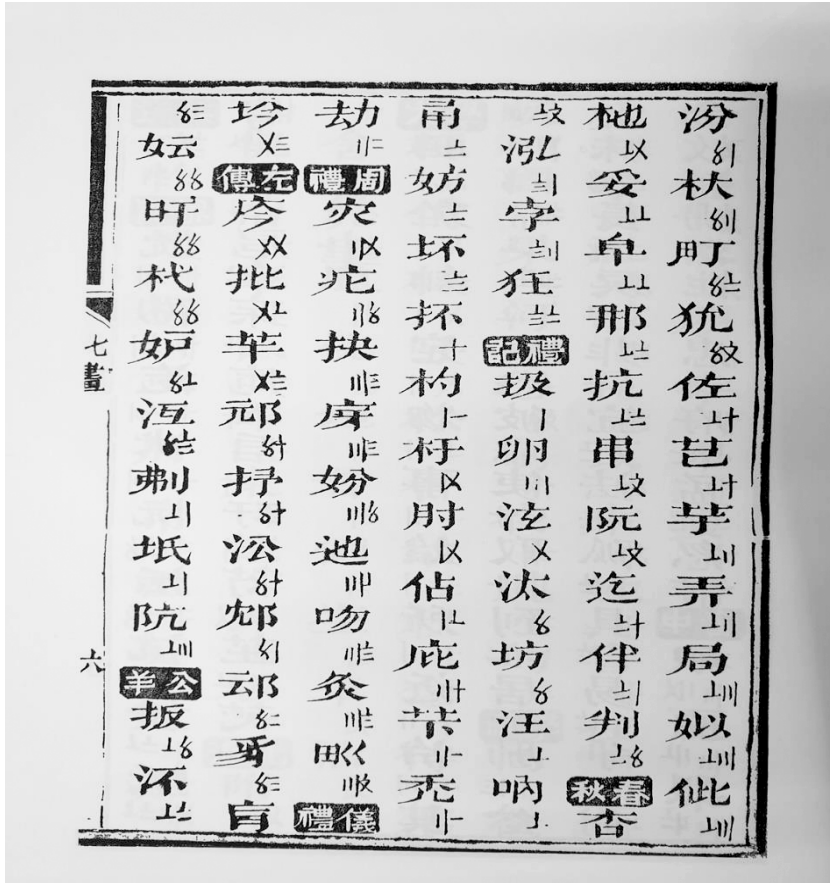
51 潘子聲，《養蒙針度》，頁 10。

52 如果我的讀數正確，那麼就是 6,727 個字。在後文裡我還會討論這些數字是如何書寫的。

53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267.

54 [清]黃蕙田，《十三經集字音釋》（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13），收入《晚清四部叢刊》，第 9 編，經部，冊 4、5。

圖 2 黃蕙田書中索引例示



資料來源：〔清〕黃蕙田，《十三經集字音釋》，收入《晚清四部叢刊》，第9編，經部，冊5，頁6上。

筆者認為，聖彼得堡手稿的作者應該仔細讀過《十三經集字音釋》，而且受到啟發。手稿與至少兩個版本的《十三經集字音釋》中的奇特索引明顯相似。辭書中的漢字，黃蕙田首先是按筆畫順序來編列，希望讀者可以通過索引「照畫檢字」，這個方法對《康熙字典》與《字彙》的讀者而言並不陌生。之後，辭書又分篇章，以此來排列書中的漢字，而十三經每一經都對應辭書中的某個

篇章，例如，第一篇章先列出《大學》中的漢字，次則列出《中庸》裡的漢字，以此類推。

黃書的索引，在清代辭書中獨樹一幟。某字到底見於書中的哪一頁，它甚至可以引導讀者直接找到。例如，根據索引，「妖」字可見於《十三經集字音釋》「中庸」篇章的第 38 頁，直接翻到那一頁，確實就能找到。也就是說，這個索引可以幫助讀者通過標明的數字檢索到某個字。這種檢字方法與西方書籍中的頁碼索引幾乎相同，而與其他清代書籍中的索引差異甚大；目前還很難說黃氏有受到清代書籍史上寥寥幾位先驅的啟發。⁵⁵黃氏將他的索引稱作「檢字」的工具。「檢字」一詞見於《康熙字典》與《字彙》，然而它們僅告訴讀者某一字會出現在辭書裡的哪一卷或哪一節。⁵⁶如同清代其他一些辭書作者，黃氏也遵循《康熙字典》和《字彙》的慣例，在卷首提供了「檢字」索引，但他同時又對此方法做了進一步的改善。

（六）蘇州碼

除了功能性之外，黃蕙田書中另外還具有一個異於其他同類書籍的特點：索引並不是用漢字的數字寫法來標明頁數，而是使用所謂的蘇州碼。蘇州碼在中國受到廣泛使用，但極少出現在印刷品中。雖然如此，在聖彼得堡手稿中也見到了蘇州碼。《十三經集字音釋》和聖彼得堡手稿兩者對蘇州碼的使用方法

⁵⁵ 學者只發現了兩種與黃書相似的索引。我所知道的最早輔助讀者定位頁碼的工具，來自於耶穌會士陽瑪諾（Manuel Dias the Younger）的《聖經直解》（1636-1642）。此書的索引包括了卷數和頁數。關於陽瑪諾的索引，參見康志杰，〈一部由歐洲傳教士編纂的索引——評陽瑪諾的《聖經直解雜事之目錄》〉，《辭書研究》，2000年第4期，頁140。關於陽瑪諾的其他作品，參見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76。目前所知，只有一部作品使用此種索引，而與天主教傳教無關。這部作品就是蔡烈先的《本草萬方鍼線》，出版時間稍晚於順治十二年（1655）。此書的出版歷史略為複雜，參見何廣益、張詩哈、李良松，〈《本草綱目》明清版本述要〉，《天津中醫藥》，2017年第7期，頁462-463。

⁵⁶ [明]張士佩，《洪武正韻玉鍵》（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索書號 016081-82）也是如此。參見潘樹廣編著，《古籍索引概論》（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實際1985年印製），頁17；張琪玉，〈20世紀20-30年代我國的索引運動：回顧與啟示〉，《張琪玉索引學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頁16。

不盡相同，一個是用它來告知讀者頁數，另一個則是用它來記錄漢字的數量。然而，兩者的編排方式看上去卻非常相似，在動輒長達數頁的列表中，蘇州碼與漢字都是交替出現。因此，儘管目前還無法斷定，但仍可推測，聖彼得堡手稿的作者之所以會使用蘇州碼，可能即是受到黃書索引的啓發。

在明清時期，蘇州碼有許多已知的變體，而它的起源更爲古老悠久。十九世紀末，蘇州碼在北京被職業人士用來書寫收據，學者認爲蘇州碼當時大多是被用來計數，往往信手寫來而不規範，在涉及各方利益的正式經濟合同中，鮮少使用。⁵⁷因此，在《十三經集字音釋》刊刻出版的索引中見到蘇州碼，頗讓人意外。聖彼得堡手稿明顯亦是一部耗費心血之作，手稿作者或許有將其出版流傳的打算，其中對蘇州碼的使用也同樣值得注意。

聖彼得堡手稿和黃蕙田書中索引所用到的蘇州碼變體，早在明人程大位（1533-1606）《算法統宗》一書中就有過描述。⁵⁸數學史家錢寶琮（1892-1974）將這種變體稱爲「習用數碼」。⁵⁹蘇州碼的書寫順序與漢字大相逕庭，不是從右往左縱向書寫，而是由左至右橫向書寫。⁶⁰從結構上來說，蘇州碼和阿拉伯數字極爲相似，都是十進位制，符號從零到九；除了環形的零（「○」）和開放環形的五（「⋈」），大多數字符都是由橫線、直線和斜線組成，而且每一個字符都不超過四畫。這些符號的橫豎筆畫，是算籌的視覺模擬；算籌是中國古代的一種計數工具，不過到晚清時期早已沒落。⁶¹

⁵⁷ 杜翔，〈小議館藏契約中的記數符號「蘇州碼」〉，《首都博物館論叢》，總輯 31（2017 年 12 月），頁 258-259。

⁵⁸ 關於程及其流行甚廣的數學手冊《算法統宗》（1592 年），參見 Jiří Hudeček, “Mathematical Practi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inese Compilation *Suan fa tong zong*,” *European Offroads of Social Science*, vol. 1 (2010), pp. 4-17.

⁵⁹ 錢寶琮，《古算考源》，收入杜石然主編，郭書春、劉鈍執行主編，《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卷 1，頁 5。

⁶⁰ [明]程大位，《新編直指算法統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清康熙五十五年 [1716]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天文算法類，冊 1044，卷 1，頁 3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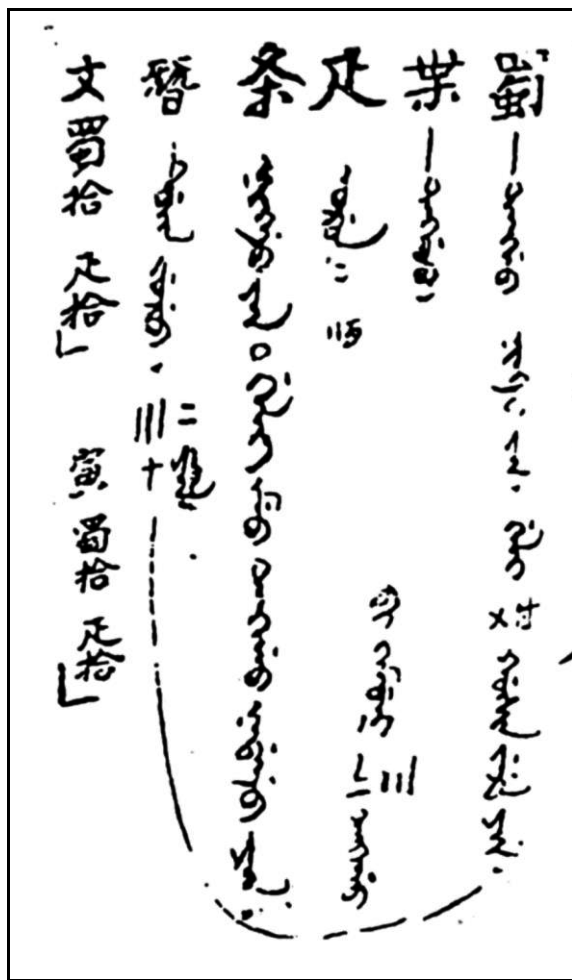
⁶¹ Jean-Claude Martzloff, *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trans. Stephen S. Wilson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6, corrected edition), p. 210.

這兩部文本所使用的蘇州碼標記並非完全相同，但仍可見若干符合之處。聖彼得堡手稿裡記載的數目字可達五位數（例如《康熙字典》的總字數），因此用到了蘇州碼中的字符「○」來表示 101 以上有零的數字。用蘇州碼來標明頁數的《十三經集字音釋》一共有四卷，每卷都不超過百頁，所以在黃書索引中最多只有兩位數，並沒有像手稿那樣使用「○」。有趣的是，它們兩者與錢寶琮所謂的「習用數碼」間還是有點差異，而且差異是一樣的，都是以漢字的「十」來表示十、二十等一百以內的十進位數字。

聖彼得堡手稿中的數字符號另有一個特別之處，是黃書索引所沒有的，也就是將漢字與蘇州碼混用。程大位《算法統宗》雖然也提到蘇州碼用「○」來表示十進位數字（如五十七，作「 $5 \div \text{○}$ 」），但因說明簡略，而未提到三位數以上的數字記載方式，也沒有提到十、百、千等漢字。而聖彼得堡手稿除了「○」之外，同時也使用「十」、「百」、「千」、「万」這四個漢字來表示數目，且會把它們寫在對應的蘇州碼下方。更重要的是，聖彼得堡手稿還用這些漢字來表示不是以零結尾的數字。舉個例子，前面提到，手稿統計了《五方元音》的漢字，總計有 34,081 個字，這個數目字中，漢字「万」被寫在蘇州碼「卅」（三）下，「千」字在蘇州碼「×」（四）下，蘇州碼「○」字下面沒有字符，因為已經有環形的零清楚表示了，而漢字「十」則寫在蘇州碼「≡」（八）下方。

聖彼得堡手稿有可能只是單純反映出蘇州碼的既定用法，而非某種教學方式的創新。不過，也有可能是手稿作者希望其著作能夠被更多人讀到，所以使用這些漢字來幫助不諳蘇州碼的讀者解碼。上文提到，漢軍旗人學者唐英曾經統計若干儒學經文的字數，日常札記中也曾將蘇州碼與滿文數字混合在一起（圖 3）；然而唐氏的筆記看上去更像是隨意的戲作，相較之下，聖彼得堡手稿反倒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系統性與抱負。

圖 3 唐英對於漢字、滿文字和蘇州碼的同時混用



資料來源：張發穎主編，《唐英全集》，冊 2，頁 398。

五、滿文與旗人在中國語言文化變革中的角色

前文筆者討論了聖彼得堡手稿中「冊子」所提及的書籍，還有作者如何參考與利用它們，包括明清時期若干辭書經典之作，如《字彙》、《康熙字典》、年希堯補訂的《五方元音》，以及一些創作於十九世紀的字書，如趙培梓的《剔弊元音》和黃蕙田的《十三經集字音釋》。這些書目顯示出，手稿的作者對於學習文言文和官話所需的重要參考文獻相當熟稔。面對漢語書籍中的龐大字量，要如何有效吸收、便利學習，手稿作者與辭書的作者們一樣，也都很關心。作者所參考的辭書中，有幾本之所以暢銷，便在於它們能幫助讀者在大部頭典籍中，快速查找到某一個漢字。另外幾本，尤其是《康熙字典》，則是以博洽完備著稱。最有趣的是《十三經集字音釋》的索引，它使用了一套數碼速記法，而且極為精確。

帶有索引的《十三經集字音釋》，標誌著文字檢索工具的新發展。它的檢字功能顯然受到《字彙》和《康熙字典》的影響，但又有所改良，顯示出它企圖對經典中高達六千多的漢字進行數目管理，以利學習掌握。聖彼得堡手稿亦反映出同樣的抱負。和《十三經集字音釋》的索引一樣，這部手稿也講求資訊管理，不過卻是朝向另一個新的、不同的方向發展。

聖彼得堡手稿的作者並不在乎資訊檢索的效率，它在意的是漢字數量的多寡與漢字的編排、記載方式。在強調文本記誦的中國教育傳統中，獲知漢字數量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要性，必須知道儒家經典包括的字數，才好準備科舉考試。明清時期，跟前述唐英一樣，也有不少人為此計算過儒家經典的字數，並採用新式的數字符號來標記。唐英時而用滿文、時而用蘇州碼來標示數字。聖彼得堡手稿的作者用滿文來書寫，但卻選擇用蘇州碼來記錄數字，這或許是因為蘇州碼速寫方便，又不大佔頁面空間的緣故。

相較於唐英，聖彼得堡手稿作者不僅止於略加修飾地沿用既有傳統而已。這部手稿統計的不是儒家經典或者詩文中的字彙，而是辭書中的字數。細讀手

稿中兩份清冊的內容，讀者不僅可知道《康熙字典》和《五方元音》蒐集了多少漢字，還能知道它們是如何編排這些漢字的。由於《康熙字典》和《五方元音》分別根據字形、字音來排序，因此在結構上互補，面對浩如煙海的漢字，讀者可以按偏旁以及官話讀音的編排方式來找到所需要的字。這種針對漢語書寫系統的定量計數，明顯不同於民國初年的新式教育，但兩者對漢語文字按形與音等具體指標進行量化研究的動機，卻有可類比之處。聖彼得堡手稿並非僅僅是對切割經典長度以便記誦這個舊風的強化；和梁啟超論兒童教育的文章一樣，手稿也應被視為十九世紀晚期漢語文化經歷劇變時所引發的迴響。在將中西文化進行對照比較的背景脈絡下，梁啟超對漢語基本文獻進行了量化，然而這顯然並非聖彼得堡手稿作者的志向所在。雖然這部手稿和受到西方影響的教育改革彼此之間並無明確聯繫，但是它對字數統計的關注以及字母符號的使用（滿文、蘇州碼），出乎意料地預示了一種尚在萌芽中的資訊強化管理（inten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傾向。這種傾向在此後數十年間愈演愈烈。⁶²

從根據字音、字形量化漢字及其選擇的語源材料來看，聖彼得堡手稿無疑是晚清文化變革大勢中的一個縮影。然而，手稿創作於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這提醒我們需更加思考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手稿中滿文語言文字的存在意義，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在十九世紀末的書籍中，非漢語材料與漢語的概念、文本、詞彙同時出現的情況並不罕見。熟悉晚清思想史的人可能會認為這些非漢語材料都來自海外，其實不然。梁啟超和他的同道嘗試將中國語言文化置於一偌大的國際秩序中，在這一體系內，西方和日本都佔據重要的位置；然而在這些漢人知識分子的著述裡，清廷所使用的語言基本上都無可尋覓。可是在聖彼得堡手稿中，情況卻非如此。它的存在說明了，以梁啟超等人為首的知識群體，他們的訴求並

⁶² 參見 Ulug Kuzuoglu, “Codebooks for the Mind: Dictionary Index Reform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2-1937,” *Information & Culture*, 53:3-4 (2018), pp. 337-366.

不能代表當時所有試圖創新的作者，滿文仍然是晚清書籍文化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滿文在聖彼得堡手稿中扮演著若干不同的角色，它既是一種語言，又被當成一種用來記載官話漢語的書寫文字。在翻譯漢語書籍的標題、記錄職官、標識某一道教文獻日期時，它被當作一種獨立完整的語言來使用，用滿文的字符來記錄滿文的用詞。在其他情形下，例如在食譜和道教短文裡，滿文字符則是被用來記載官話漢語。最後，在「冊子」當中，有很多漢字，特別是稀見漢字，都帶有滿文注音。前文已論及，這類用法其實於清代更早已有先例。有趣的是，在聖彼得堡手稿中，滿文字符顯然被當成一種便利的速記形式，而且是出自一位相當熟悉漢語書寫方式的作者之手；手稿作者確實用滿文注釋了不少相對生僻的漢字，但他無疑也已有了一定的漢語書寫能力。話說回來，手稿作者仍選擇了用滿文字而非漢字來書寫，這一點還是值得我們注意。

聖彼得堡手稿的作者似乎發現，表音的滿文字符顯然是用來記載黃瓜、碎蘿蔔籽（*sui lo bo dzi*）用量這類零碎食譜訊息最爲便捷的記錄工具。除了對漢字量化計數和改善訊息管理方式，手稿中這類對清朝欽定文字的日常使用，也呼應了十九世紀末的其他潮流。前言已經提過，用語音符號來書寫白話漢語的做法一直被認爲是受到西方的影響，但實際上這早已植根於清代的語言文化之中。就目的而言，清代這種做法與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的設想並無二致，都是爲了找到一種便捷的辦法來書寫白話漢語。聖彼得堡手稿顯示，早在切音字運動初期，一位無名的旗人就已在用滿文字熟練地書寫官話漢語了。

聖彼得堡手稿還讓我們意識到，這種用滿文字記錄官話的悠久傳統，直到清朝統治的最後二十年間仍存在於日常中。與此同時，其他旗人作者則開始利用滿文的拼音屬性來教授官話。官話可以、甚至越來越常用滿文字來書寫，使得滿文成爲官話教學的工具。到晚清時期，通曉滿文的旗人日益被視爲官話說得最標準、值得仿效的群體，也更加促進了這項發展。

對於居住在通商口岸的西人來說，直到十九世紀中期，南京官話仍是流傳最廣、最佔優勢的漢語。由於太平天國戰爭在江南地區造成的破壞和動亂，文化的天秤才開始向北京傾斜。⁶³然而在此之前，南方漢人已經開始將旗人視為說官話的權威。例如，早期官話課本《官語詳編》的作者是廣東人，在雍正七年（1729）的序言裡，他提到曾在旗人官員家裡學官話的經歷，甚至在書裡使用了一些滿文語彙。滿文和官話在同一個文本中共存，即是這兩種語言互關聯的明證。⁶⁴當西方人和日本人開始學習和教授北京官話、編寫教材時，他們依靠的是更早時期的滿文教材，並延請旗人作老師。⁶⁵

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利用滿文字書寫官話的做法在漢語教育中被更進一步地推廣。咸豐十年（1860），莎彝尊（Idzun，活躍於 1837-1881）就使用過滿文在廣州教授官話。⁶⁶後來，切音字運動的一些參與者也繼續以類似方式利用滿文，例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前後李鼎臣（c. 1831-c. 1911）在廈門的活動。⁶⁷

⁶³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What Was Standard Chine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ivergent Views in the Times of Transition," in *Language Diversity in the Sinophone World*, pp. 13-38.

⁶⁴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Manchu, Mandarin,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Spoken Language in Qing China," in *Language Diversity in the Sinophone World*, p. 46. 最早注意到《官語詳編》的學者是高田時雄，參見氏著，〈清代官話の資料について〉，《東方學論集：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京：東方學會，1997），頁 771-784。

⁶⁵ 尾崎實，〈『官話指南』をめぐって——明治期日中文化交渉史の一側面〉，《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々報》，号 52（1991），頁 4；高田時雄，〈トマス・ウェイドと北京語の勝利〉，收入狭間直樹編，《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70 周年記念シンポジウム論集》（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1），頁 127-142；Elisabeth Kask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p. 69；竹越孝，〈滿洲語教材から北京語教材へ——清代滿漢対訳会話書の言語とその変容〉，《中国言語文化学研究》，号 5（2016），頁 39；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A Guide to Mandarin, in Manchu: On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Guanhua Zhinan* (1882)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9:1 (Feb. 2019), pp. 13-17.

⁶⁶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Alphabets *Avant La Lettre*: Phonographic Experi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1:3 (Oct. 2016), pp. 251-252.

⁶⁷ 王爾康，〈關於漢字改革運動的歷史前奏與揭幕人〉，《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4 年第 2 期，頁 87-98；王爾康，〈早期漢字改革運動與閩南方言〉，《中國語文》，1983 年第 4 期，頁 290-297。

表 1 王照音節首的轉寫

6.	5.	4.	3.	2.	1.
[e]	a	mi	te	cu	qi
ei	ai	mu	de	zu	ji
en	an			su	xi
eng	ang	ri	ti		
er	ao	ru	di	ci	yi
	ê			zi	ni
		fu	tu	si	li
		[v]u	du		
				chi	qu
			pi	zhi	ju
			bi	shi	xu
			pu	ke	yu
			bu	ge	nü
				he	lū
			lu		
			nu	ku	chu
				gu	zhu
			le	hu	shu
			n[e]		

此外，王照發明的官話字母是按照一位名叫廷俊的旗人武官教給他的滿文字頭順序來排列的。在修訂本中，王照寫道：「廷翰卿防禦所更訂，依仿滿文，容易記誦。翰卿，名俊，為西陵駐防旗人，以字母授人，窮年不倦。」⁶⁸

圖 4 和表 1 分別是王照注音符號的原文和轉寫，⁶⁹右起一至四行是聲母（王氏叫做「音母」）。如果將王照的注音系統和滿文「十二字頭」進行比較，就

⁶⁸ 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頁 11b；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Alphabets Avant La Lettre: Phonographic Experi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1:3, p. 253. 關於王照的注音符號順序受滿文影響、帶有滿文轉寫的表格和對應的說明文字，參見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Manchu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China (1607-1911)”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5), p. 429, figure 8.3.

⁶⁹ 關於帶有滿文轉寫的表格和對應的說明文字，參見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Manchu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China (1607-1911),” p. 429, figure 8.3. 轉寫表格主要依據的是張金發，〈清

會發現他們的順序是一致的。比如，在這兩個系統中，舌根音依次都是 k-g-h。更明顯的是，王照注音符號中的韻母（王氏叫做喉音，右起第五、六行）的順序和滿文「十二字頭」也是一致的；王照系統的前四個韻母（無、-i, -n, -ng）和「十二字頭」中的順序相同。而元音 a 在 e 前，這也和「十二字頭」吻合。在王照看來，相同的順序能使會滿文的讀者更易於接受他的注音方式。

最後，再舉一個旗人參與晚清語言文字改革的例子。光緒二十九年（1903），旗人王璞開辦了一所學校，教授王照的注音符號。⁷⁰宣統元年（1909），一名認識王璞的德國觀察員評論道：「人們不斷地詢問這套新系統的起源……並暗示王氏注音符號簡潔的形式是源自日語。它和日語的淵源很難被否認……但這套拼寫方式是滿語式的。幾乎所有這套新系統的支持者都是滿人。」⁷¹

從聲名不顯的李鼎臣到更出名的王照等人的行動，證明了從清代中期甚至更早，被用來記錄官話的滿文字，其實也啓發了不少切音字運動的參與者。面向西方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可能沒有注意到旗人和他們的語言資源，反而是上述一些外國觀察員，注意到旗人對改革漢語書寫系統相當支持。

聖彼得堡手稿提供了理解旗人何以在社會各個層面積極參與切音字運動的一個特定視角。這部未完成、也未發表的作品，證實了用滿文書寫官話的做法，以及對辭書進行量化計數以求掌握漢語書寫系統的企圖。如果在默默無名的旗人群體中存在一群類似的作者，那麼也就不難理解，即使他們不像梁啟超那樣懂得西方或日本的語言文字，但也仍然會支持切音字運動的態度和做法。

末民國四種國語語音教材拼音方案比較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頁 114，但又有所改動。

⁷⁰ 白莎（Elisabeth Kaske）已經注意到了王璞和這位德國觀察者的關係，參看 Elisabeth Kask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pp. 136-137.

⁷¹ C. W. Kastler, “Die neuesten Versuche zur Vereinfachung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Erste Abteilung*, vol. 12, p. 207.

六、結 語

本文從各個方面詳細討論了這部聖彼得堡手稿。乍看之下，這部手稿缺乏明確的歷史語境，除了簡單的編目訊息外，唯一的線索就是手稿的內容。爲了將這部手稿放入合適的文化語境中來理解，本文分析了手稿對語言（漢語、滿語）和字符（漢字、滿文字、蘇州碼）的使用，並討論了手稿中提到的書目。聖彼得堡手稿羅列的書籍，一方面包括明末清初用來書寫和誦讀文言文的常用辭書，另一方面也包括十九世紀頗具新意的教學手冊。手稿所勾連的這些材料，恰好表明它正處在一個具備悠久歷史而又變動不居的書寫文化之中。筆者認爲，這部從未出版的手稿，應被視爲清末文化變革的一種表徵。和當時聲望最高、更爲後人所銘記的晚清學者不同，聖彼得堡手稿的作者並未嘗試從西方或日本尋找靈感，來對中國的書寫系統和語言文化遺產進行改造，而是選擇挖掘本土現存的文化資源，並試圖另創新意，期能藉此更掌握中國語言文字。

聖彼得堡手稿和它所提及的參考文獻，暗示著儘管漢語文化無可辯駁地在十九世紀末正發生劇變，但變化的方向事先並未能夠確定。假設滿人主導的清帝國沒有崩潰，或者雖然崩潰了，卻允許滿文讀寫存在於各機構和教育傳統中，那麼二十世紀中國的語言秩序或將大不相同。我們應該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以避免陷入一種目的論觀點，亦即只將西方、日本以及具現代化精神的知識分子視爲晚清變革的力量，而無視有如同聖彼得堡手稿作者這般懷抱不同傾向的人士存在。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明〕張士佩，《洪武正韻玉鍵》，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索書號 016081-82。
- 〔明〕程大位，《新編直指算法統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天文算法類，冊 10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
- 〔清〕王昶著，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點校，《春融堂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以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初刻本為底本，同時參校光緒十八年（1892）補刻本。
- 〔清〕沈學，〈盛世元音〉，收入文字改革出版社輯，《拼音文字史料叢書》，冊 2，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影印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6 年第 1 版，該版底本為清光緒二十二年 [1896]《申報》與《時務報》刻本。
- 〔清〕凌紹雯、〔清〕張玉書奉敕纂，《康熙字典》（康熙五十五年[1716]版），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古籍特藏系統，索書號 T/5173/0735，原件掃描版開放閱覽：[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7752267\\$1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7752267$1i)。
- 〔清〕秦文淵輯，〔清〕陳正宣校，《四書總字音》（嘉慶十二年[1807]版），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古籍特藏系統，索書號 T/885/5903。
- 〔清〕乾隆五十一年敕撰，《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清〕黃蕙田，《十三經集字音釋》，收入《晚清四部叢刊》，第 9 編，經部，冊 4、5，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13。
- 〔清〕樊騰鳳著，趙培梓改編，《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上海：上海廣益書局，民國年間石印本。
- 〔清〕樊騰鳳撰，〔清〕年希堯增補，《五方元音》（雍正五年[1727]版），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清〕樊騰鳳撰，〔清〕年希堯增補，《五方元音》，收入《中華漢語工具書庫·韻書部》，冊 62-6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影印道光十三年（1833）《棣香齋叢書》重刻康熙四十九年（1710）版本。
- 〔清〕潘子聲，《養蒙針度》，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
- 張發穎主編，《唐英全集》，冊 2，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
- 梁啟超，《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冊 2，卷 2，上海：中華書局，1926。

- Cibot, Pierre-Martial (韓國英). “Essai sur le passage de l'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 à l'Écriture alphabétique, ou sur la maniere dont la premiere a pu conduire à la seconde.” Dans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c. des Chinois*, vol. 8. Paris: Nyon l'aîné, 1782, pp. 112-132.
- Kastler, C. W. “Die neuesten Versuche zur Vereinfachung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Erste Abteilung*, vol. 12 (1909), pp. 199-209.
- nikan hergen-i ton be baicame araha cese 查寫漢字數目的冊子，清鈔本，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索書號：C 58 mss。

二、專著

- 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 李新魁、麥耘，《韻學古籍述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 李清桓，《〈五方元音〉音系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 林玉山，《中國辭書編纂史略》，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 陽海清、褚佩瑜、蘭秀英編，《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 II. E. 斯卡奇科夫著，B. C. 米亞斯尼科夫編，柳若梅譯，《俄羅斯漢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附蒙學書目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 潘樹廣編著，《古籍索引概論》，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實際 1985 年印製。
- 福田襄之介，《中国字書史の研究》，東京：明治書院，1979。
-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3。
-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 錢寶琮，《古算考源》，收入杜石然主編，郭書春、劉鈍執行主編，《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卷 1，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 Blair, Ann M.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rockey, Liam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Coblin, W. South. *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Kałużyński, Stanisław. *Die Sprache des mandschurischen Stammes Sibe aus der Gegend von Kuldsha*.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77.
- Kaske, Elisabeth.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Leiden: Brill, 2008.

- Pang, Tatjana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Manchu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ssue 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1.
- Tsu, Jing.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Walravens, Hartmut. *Aleksej Osipovič Ivanovskij, A Little Known Russian Orientalist: A Biobibliographical Sketch*. Hamburg: C. Bell, 1982.
- Walravens, Hartmut, ed. *Mandjurische Bücher in Rußland: Drei Bestandskataloge*. Hamburg: C. Bell Verlag, 1986.
- Zhong, Yurou. *Chinese Grammatology: Script Revolution and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1916-195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三、論文及專文

- 王爾康，〈早期漢字改革運動與閩南方言〉，《中國語文》，1983年第4期，頁290-297。
- 王爾康，〈關於漢字改革運動的歷史前奏與揭幕人〉，《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4年第2期，頁87-98。
- 竹越孝，〈滿洲語教材から北京語教材へ——清代滿漢対訳会話書の言語とその変容〉，《中国言語文化学研究》，号5（2016），頁37-50。
- 杜翔，〈小議館藏契約中的記數符號「蘇州碼」〉，《首都博物館論叢》，總輯31，2017年12月，頁255-263。
- 尾崎實，〈『官話指南』をめぐる——明治期日中文化交渉史の一側面〉，《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々報》，号52（1991），頁4。
- 何廣益、張詩吟、李良松，〈《本草綱目》明清版本述要〉，《天津中醫藥》，2017年第7期，頁461-463。
- 汪銀峰，〈年希堯增補《五方元音》與清代官話音系〉，《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第2期，頁184-191。
- 宋韻珊，〈試論《五方元音》與《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的編排體例〉，《聲韻論叢》，輯7，1998年3月，頁137-154。
- 林慶勳，〈論《五方元音》年氏本與樊氏原本的音韻差異〉，《高雄師大學報》，期2（1991年3月），頁160-174。
- 康志杰，〈一部由歐洲傳教士編纂的索引——評陽瑪諾的《聖經直解雜事之目錄》〉，《辭書研究》，2000年第4期，頁138-142。
- 周賽華，〈《五方元音》版本考〉，《古籍研究》，2016年第2期，頁73-80。
- 胡琳、馮蒸，〈樊騰鳳原本《五方元音》音節統計與分析〉，《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8期，頁28-41。

- 高田時雄，〈トマス・ウェイドと北京語の勝利〉，收入狹間直樹編，〈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70 周年記念シンポジウム論集〉，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1，頁 127-142。
- 高田時雄，〈清代官話の資料について〉，〈東方學論集：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京：東方學會，1997，頁 771-784。
- 張金發，〈清末民國四種國語語音教材拼音方案比較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
- 張琪玉，〈20 世紀 20-30 年代我國的索引運動：回顧與啓示〉，收入《張琪玉索引學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頁 16-20。
- 張曉，〈《五方元音》研究述評〉，《濟南職業學院學報》，2006 年第 6 期，頁 70-74。
- Bai, Limin. “Children and the Survival of China: Liang Qichao on Education Before the 1898 Reform.” *Late Imperial China*, 22:2 (Dec. 2001), pp. 124-155.
- Forke, A. “Ein islamisches Tractat aus Turkistan. Chinesisch in arabischer schrift,”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8:1 (1907), pp. 1-76.
- Hudeček, Jiří. “Mathematical Practi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inese Compilation *Suan fa tong zong*,” *European Offroads of Social Science*, vol. 1 (2010), pp. 4-17.
- Kałużński, Stanisław. “Федор Муромский и собранные им в Кульджинском район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32:2 (1969), pp. 63-75.
- Klöter, Henning, and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eds. *Language Diversity in the Sinophone World: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Language Planning, and Multilingual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2020.
- Kuzuoglu, Ulug. “Codebooks for the Mind: Dictionary Index Reform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2-1937.” *Information & Culture*, 53:3-4 (2018), pp. 337-366.
- Martzloff, Jean-Claude. *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Translated by Stephen S. Wilson.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6, corrected edition.
- Rawski, Evelyn S. “Qing Publishing in Non-Han Languages.”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304-331.
- Schmidt, P[eter]. “Chinesische Elemente im Mandschu. Mit Wörterverzeichnis.” *Asia Major*, vol. 7 (1932), pp. 573-628.
-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A Guide to Mandarin, in Manchu: On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Guanhua Zhinan* (1882)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9:1 (Feb. 2019), pp. 1-28.
-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Alphabets *Avant La Lettre*: Phonographic Experi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1:3 (Oct. 2016), pp. 234-257.

-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Manchu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China (1607-1911)."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5.
-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Shape and Sound: Organizing Dictionar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ictionaries: Journal of the Dictionary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no. 35 (2014), pp. 187-208.
-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The Manchu Scrip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ome Aspects of Qing China's Great Encounter with Alphabetic Literacy." In Benjamin A. Elman, ed.,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s, 1000-1919*, pp. 169-197. Leiden: Brill, 2014.
- Yu, Li. "Character Recognition: A New Method of Learning to Rea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33: 2 (Dec. 2012), pp. 1-39.

The Quantification and Reform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in a Late Qing Bannerman's Notebook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

Translated by Zhang Xue **

Abstract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aint Petersburg, holds a curious notebook with a few loose pieces of paper folded among its pages. It is anonymous, but dated 1893. The manuscript has characteristics that link it to classical Chinese education, Manchu, and a kind of demotic Mandarin literacy; and it is obviously a product of the plurilingual written culture of late Qing bannermen. This article will be guided by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wha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ulture did the Saint Petersburg manuscript partake, and in what way did it innovate to carry that culture forward? How did it use the Manchu script, and what were the precedents for such usage?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will show that modern Chinese book his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cannot be properly understood without taking the Manchus and their particular linguistic resources into account.

Keywords: Manchu, language, written culture, late Qing, bannermen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History Department, Reed College